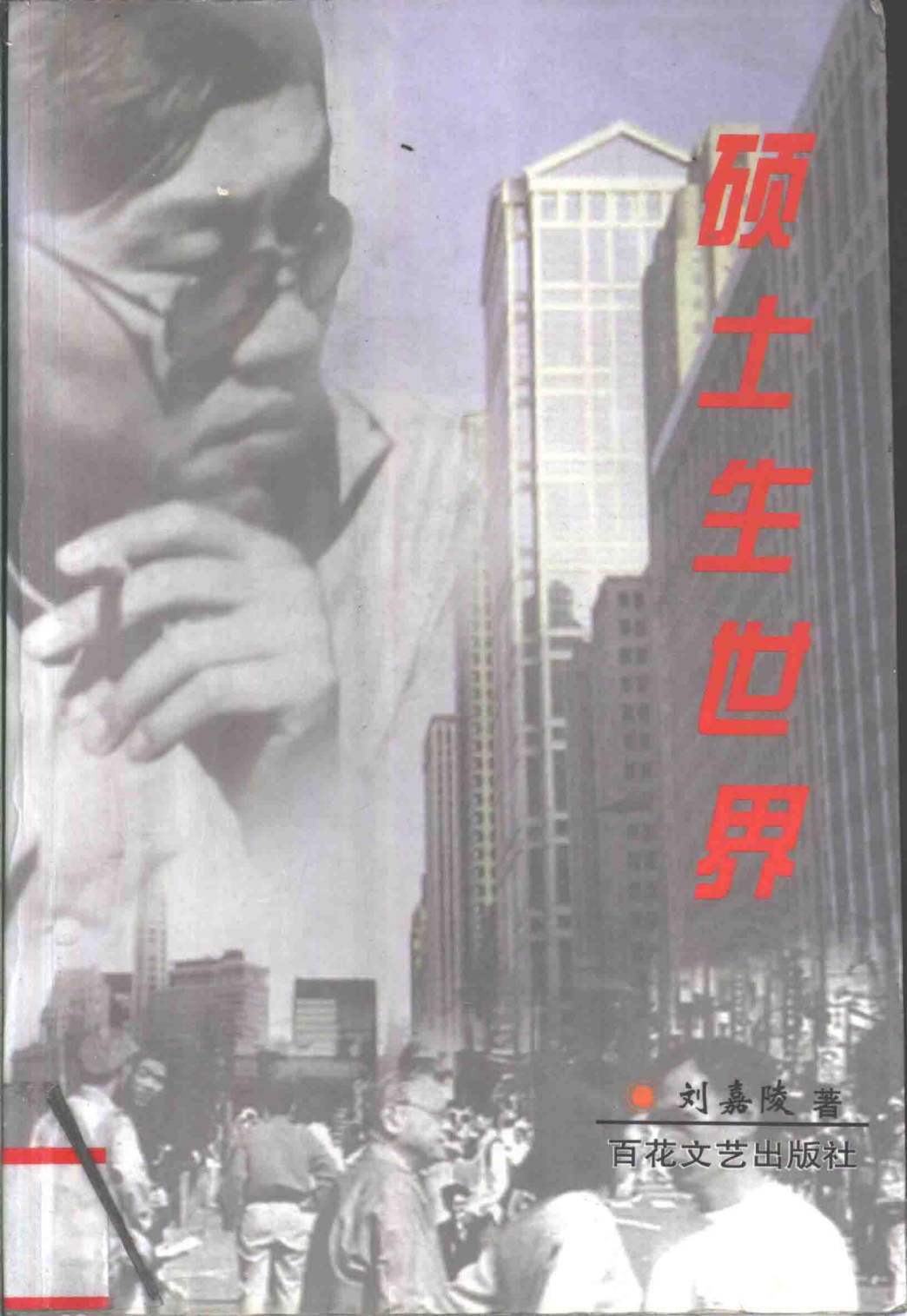




硕士生世界

● 刘嘉陵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硕士生世界

● 刘嘉陵 著



我们这茬研究生一百多人,全国各地哪儿来的都有。南腔北调,长短阔狭,参差错落得很。让人不晓得从哪里突然空降了这么些牛头马面。可一旦戴上那绿色校徽,身份便不言自明了。我们的情绪于是极好。但又尽量掩饰自己,努力不笑,皱着眉头苦苦思索民族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

《硕士生世界》

阿钟去美国之前,又用他演奏过《圣母颂》的铁拳吻了下我的脸庞,之后我们就抱头痛哭,一面哭一面大口喝着蓝带啤酒。那时候落地式玻璃窗外人来车往,我们这小小的游戏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

《游戏时代》

有一个中文系老大哥告诉我,女人说我爱你时,她心里肯定还有别人,而一旦她说我恨你,这种时候你才可以放心大胆地等着做新郎。

《1984年8月5日黄昏》

在先锋与写实之间(代序)

人永远是故事的讲述者,他在自己和别人的故事的包围中生活。通过这些故事,他理解对他所发生的一切。并且他要努力这样生活:似乎在讲述这生活的一切。

——让·保尔·萨特

刘嘉陵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似乎总在讲述着他的生活。

在一代人的背景下,他的生活显得时空辽阔却又比较平常,按他的自述,也就是“插过队,当过乡村教师,开过机床,做过扶贫工作队员。作过曲,研究过明清小说”等等。但刘嘉陵对自己的这些经历却是分外珍惜的,甚至到了骄矜和不可侵犯的程度。因此,集中读完他近年来发表的小说和部分散文,我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萨特的那段话。

让·保尔·萨特是一个难忘的标志,他的名字亲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我们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大学生活。我就是在那段日子和刘嘉陵相识的。作为同一校园里的 fellow(本义为“同类”,又指研究生),我们的初次见面有点像后来被普遍模仿的“零度叙述”,彼此都力求客观和冷漠。这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研究生的身份还很重,况且那又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我们的眼前正不断地闪过如云的本科少女,她们每一个都像是潜在的西蒙·波娃,激励着我们努力像萨特那样自命不凡。不过,我觉得刘嘉陵的冷漠

中还包含着另一种意味——如同诗人T·S·艾略特《荒原》第一批里的意味,那就是宣告自己的经历:他是插过队的人,并且开过机床等等。

我这样说,可能使刘嘉陵显得过于炫耀了,其实这只是一种方式,他以这种方式讲述生活,就像一个国家在炫耀武力。而有些时候他又绝不喜欢张扬(虽然他喜欢马尔克斯想了三十年才写出的《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他是一个关心理解的讲述者。他似乎在力图证明:讲述生活是一个人无可辩驳的权利,但同时还要有真正的交流 and 理解。

这也恰好是我对他的一部中篇的领会。我认为,在那个被称做《硕士生世界》的文本中,刘嘉陵主要是写出了一批特别的生活讲述者(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们都像是卡夫卡所说的“语言中产阶级”,聒噪而又自命不凡。他们构成了一个虚张声势的话语“世界”,并在其中渴望由“边缘”进入“中心”(尽管这些新词还尚未进入他们的话语)。

但他们也渴望理解,刘嘉陵真正讲述的就是在这些讲述者之间理解何以会成为可能,所谓“理解的命运”在这里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后来,在读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的时候,我想到了某种一致性。昆德拉指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到大街上去喊他是作家,而正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变成一个词语的世界”,我们更大的世界才面临危机,它将变成一个“缺乏理解的世界”。

从理解的角度看,刘嘉陵对讲述生活又保持了一种消解的姿态。

刘嘉陵的话语世界是不平静的,它似乎充满了“霸权”话语,充满了各种声音和音响,但在其中我们却总能听到理解的声音,以及与理解相关的对于社会(或文化)公正的某些思考。他后来写的《我给您跪下啦》、《正月的思绪》、《推销员无病呻吟》、《求见鲍总经理》等中短篇小说,都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上被看做是理解和关怀的

文本,或者说,这些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关怀”意义。

“文化关怀小说”是《上海文学》自去年开始推出的一个栏目,在此我只是借用一下提法。刘嘉陵并不是这类小说的自觉加盟者,他作品中所体现的关怀意义是早已有之的和自发的。实际上,尽管“文化关怀”的提法在我们当前这个物欲横流、强颜欢笑的“转型”环境下有着很实在的精神倡导作用(就像一个物欲时代的抒情诗人),但其内在逻辑本身似乎也需要进一步的“关怀”和追问。比如:“对弱者,关怀他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的灵魂”(《上海文学》编者语),这种对“关怀”等级的划分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因而至少在终极的层面上是非“关怀”的。且不论生存竞争意义上的“强者”是否真正的强者,就“弱者”而言,他们真的只需要“生存”的关怀而不需要“灵魂”的关怀吗?说这些大概有些离题了,其实我想强调的是,刘嘉陵的小说更侧重于表现“弱者”和他们在精神上而不是物质上的生存状态。《推销员无病呻吟》,题目就表明了一种状态,一种普遍的心灵疲惫和精神沮丧。还有《背离角色》,其基本语义可能正是对各种各样虚假“关怀”的拒绝,问题在于酒醒之后那个公司职员还是得气急败坏地重新沦为人人可以“关怀”的弱者。《求见鲍总经理》写了一个在街头修理自行车的年轻人,他忽发奇想地认为自己是(或实际上也可能是)一座银灰色大楼里的某位“鲍总经理”多年以前的私生子,并不断地发展这一幻想,似乎一旦私生子的地位被确认,他就会得到激动人心的父爱而世界将得到热泪盈眶的公正。对这些楚楚可怜的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当然是必要的,因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但他们的共同特征却不是贫困,而是疲惫、沮丧和迷茫,用一句人云亦云的话来概括,也就是找不到精神家园(就像整天谈论精神家园的我们也找不到精神家园一样)。

综观刘嘉陵近年来的小说写作,我觉得他并不像我原来想的那样趋时,或者说,他只是在某些层面上认同时尚,例如叙述语言

的层面。刘嘉陵在语言上的确是有优势的,他的叙述者和被叙述的人物似乎都显得那么谈吐不凡,这大概得益于他比较独特的话语方式。他更注重整体的而不是具体的语境生成,并在这种“语言方阵”式的语境中尽显他的机智个性和隐喻、反讽的才能。尤其是《背离角色》以及最近写的《游戏时代》、《追剿歌声》等反映现代都市人生及其心灵状态的作品,在叙述语言上更具有新潮和实验的性质。读这样的小说,你真得像E·M·福斯特所说的那样,需要“带着猎狗和猎枪”,把阅读过程变成一次对文本意义的“狩猎”。

但刘嘉陵的小说不完全是这样,在意义的层面上,他好像又很追求“写实”。这也有一些文本范例,如《干咳一声》、《五月惶惶》、《庆富老汉》、《我不认识你》、《其余都是杜撰》、《老廖在秋天的日子里》、《雾之晨》、《焚书》等。其中,我更喜欢后面这三部作品,不仅因为好读,而且因为它们表现格调的不俗。人到了“秋天的日子里”总乐于怀旧,但怀旧的泛滥则未免堕入流俗,而“老廖”的怀旧却不乏新意,他仅仅接到一位当年女同学(“文革”时代的校花)的电话,于是就感奋起来,美好起来,即使无法与之相见,他也准备继续感奋和美好下去。《雾之晨》写的是更加容易堕入流俗的场景:一男一女在舞会之后的夜生活。但刘嘉陵在讲述中却很有说服力地证明,心灵即使在最卑下的时刻也是易于感伤的,因而是趋向于纯净的。这两篇作品都写得纯净而温馨,有点像前苏联的某些小说,它们在刘嘉陵的话语世界中显得别具一格,因而也可能预示着他多方面的发展潜力。

发表在《收获》1995年第一期的短篇《焚书》在同期推出的作品中也许不是很有深度的,但却是一份可贵的记录,它记录了我们当前正面临着的精神匮乏。一个老教授烧掉了自己被人冷落的书,这本来已属平常的轶闻却被刘嘉陵讲述得如同一次严重的事件(而且他是以极客观和极平静的语气讲述的,这在他的写作中并不常见),或许实际上并不那么严重,因为人文精神总是烧不掉的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值得发问的是我们何以会走到今天?在这样的今天和明天,谁还愿像帕斯卡尔所说的那样去“好好地思想”呢?

从《硕士生世界》到《焚书》,刘嘉陵对生活的讲述似乎又在重新开始。他这一阶段的小说写作从总体看是整合式的,可以说是在“实验”中追求着“写实”的意义,在“写实”中追求着“先锋”的话语,他在进行“双向突围”,其表现就像是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所提到的“意义的撩拨者”(这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寻找自己的最佳方式或文本策略),他不断地结构又不断地消解,但在他的话语深处还是充满结构的,这是我对他的基本了解。

像他这样“德里达其外,列维—斯特劳斯其内”的年轻小说家并不少,但我总觉得他作为小说家的气质是更充分的,有时是咄咄逼人的,这包括内在的也包括外在的气质,尽管他实际上为人很谦和。

本来还应该谈一谈刘嘉陵的散文和随笔,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写作也很有实绩,但篇幅所限,我这里只能记下一些印象较深的题目,如《世界无刀日》、《送女出征》、《我爱你,啤酒》、《美丽而丑陋的城市》、《将大师挤进书橱》、《开怀大笑的历史》等。与他的小说相比,他的散文可能有更多的消解意味,并且不乏生动的议论,但也有和小说相似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我曾在另一篇关于他散文的评论中粗枝大叶地提到过,基本意思就是珍重往事,多见真情,同时也很雄辩。这些提法其实都是很泛泛的,写过之后觉得有负于刘嘉陵似的。

不过在那篇所谓的评论中我还说过这样的话:刘嘉陵“写作如仪”。对这一比较机智的评语我至今仍感到恰如其分。的确,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散文,刘嘉陵都是“写作如仪”的,他看重写作,正如他看重生活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美国南方文学大师福克纳所列举的爱情、荣誉、勇气、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以及福克纳

所象征的意义本身。实际上,福克纳就是“写作如仪”的,萨特、马尔克斯、昆德拉也莫不如此,这几乎是大师们的标志。而对于离成为大师还相当遥远的作家来说,它至少是极为宝贵的、吉祥的、美的素质。所以萨特说“要努力这样生活:似乎在讲述这生活的一切”。

刘嘉陵是这样生活的,他应该和我国许多具有美的素质的年轻作家一样,在未来的日子里把我们的生活讲述得更好。

高海涛

1995年春于沈阳



刘嘉陵：1955 年生于沈阳。插过队，当过乡村教师，开过机床，做过扶贫工作队员。现在辽宁电视台供职。文学硕士，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妙语天籁》、评论集《舞文者说》等。

目 录

在先锋与写实之间(代序)	高海涛	1
游戏时代		1
1984年8月5日黄昏		39
我不认识你		90
背离角色		104
求见鲍总经理		120
兄弟们去开研讨会		134
套上你们的长裤		148
请入我梦境		160
焚书		177

雾之晨	193
暮春或初夏	203
其余都是杜撰	212
老廖在秋天的日子里	229
关于花我们知道些什么	241
来历	253
冬夜事件	257
滑冰的人们	261
硕士生世界	265
推销员无病呻吟	328
干咳一声	369
关于小说的非正式发言(代后记)	446

游 戏 时 代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

——《丢手绢》

1

我和汪晓燕坐在遮阳篷下的白色方桌旁，解决了两碗过水面和一杯半啤酒。我衔着烟翘着二郎腿，她不停地用那块小手帕揩鼻尖，我们斜对着动物园西大门。那儿依旧人来人往出出进进，抢着为偷工减料的动物监狱送生意。看来像我们这样执迷不误的人这世上多得是呐。

垂柳无精打采纹丝不动，白色的日头比我们饿着肚子那会儿稍向西偏了偏。有一对中年男女满头大汗地打动物园方向走过来，将大包小裹咚的放在我们的桌上，就要落座。我一抬手说，有人。那女人说，有人？我说对，一共四位。男人咽了口唾沫气呼呼地说，你们不是刚刚吃完么？汪晓燕瞪了我一眼，就要起身退出历史舞台，我使劲把她摁住，笑一笑对那对夫妇说，我们只是先垫补垫补，一会儿那两位朋友来啦我们再正式叫菜。

中年夫妇拎起包裹骂骂咧咧寻别的位置去了，汪晓燕继续用手帕揩鼻尖。你这人怎么变得这么无聊？她说，忽然换了个动作，开始甩着手帕往脸上和颈上扇热风。我一甩手让烟蒂恢复了自

由，活动着脖颈说，这有什么无聊的，我不过做了个饭后小游戏。谁让他们那么实心眼儿了，这么拙劣的骗局都拆不穿。汪晓燕冷笑一声说，别自我感觉良好啦，人家是不和你一般见识！说着她站起来，挎上棕黄相间的小皮包就要走人，黄色丝质长裙下摆刮了我的小腿一下，微胖的身上顿时袭来一股热浪。从某种角度看来，她说得不无道理。虽然咱自认为智商不低，可以判断海湾战争和戈兰高地的是非曲直，但是真正碰上一些吃喝拉撒的小事情，换个说法叫做“非常具体的小事情”，咱就常常不灵。比方说你在终于决定买下一瓶二锅头之前忽然问那瓶酒的前主人：我说伙计，这是不是假的？这种话虽然非常像个老谋深算的过来人说出的，但仍然是句蠢话。即使卖主是个十足的白痴，也会对你说不是不是，要是假的你日他的祖宗。这等于发了个毒誓，你除了乖乖儿买下那瓶酒还能怎么样？我是说，一旦面对这些“非常具体的小事情”，我们的许多“大聪明”就常常等于零。所以我估摸着，如果真刀真枪地玩起骗术来，咱恐怕连叫人家师傅的资格还不见得有哩。

你坐下你坐下，我伸手拽住汪晓燕圆滚滚的小臂让她重新坐好，说再等会儿来两个看着面善的家伙，我们就让开不行么汪晓燕？

汪晓燕大惊小怪地嚷道，什么？你管我叫汪晓燕，好啊你！

我一下子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好家伙，一个女人明明叫汪晓燕，可你就是没权利这样叫她，因为她是你的老婆。如果不是她提醒，我险些又把她当成了昔日的恋人。女人的名字也真是奇妙无穷，当年我们刚刚认识时我是有权利叫她汪晓燕的，她穿着肥肥大大的大色块毛线衫和蓝色牛仔褲，袅袅婷婷敲开门向我走来，说徐志摩的诗集她已经读完了，还想再读一读朱自清的散文，那时候我就是按他们汪家户口簿上的记录直呼其名的，双方处于欧美人称“您”的兜圈子阶段。后来我可以将厚颜无耻的嘴唇在她脸上随意驰骋了，又改口叫她晓燕。也正是从那几日起，她也不再管我叫

老师直至永远。刚可以胡乱吻她那阵子我还以为自己捡了天大的便宜呢,可是随着她脾气和权威越来越大我才意识到,真正的输家原来是我。再往后,我们将各自身上的全部秘密都摊给了对方,于是我又按照要求,单称她一个燕字了,这种情况直到婚礼以后好长时间都没有改变。老实说我并不情愿这样叫她,因为随着称呼的一步步简略亲切,你的身子骨仿佛也比从前矮了许多,就像那些等着发达国家巨额贷款的发展中小国似的。本来大家在床上是通力合作共同快乐的,可到头来做贼心虚、被人家攥住把柄的却只是你一个人,这种天大的不公平你到哪说理去?男女间的关系就相当于正襟危坐的谈判双方,甲方说:我爱你。乙方说:不客气。甲方说:吻你。乙方说:没意见,但你必须出赁戈兰高地。甲方又说:我要你。乙方便说:随你便,如果你连石油开采权也一并出赁的话。

在这个夏日的午间我妻子汪晓燕提醒我注意她的权利,我能说些什么呢?立刻服从她的意愿,继续肉麻地称她“燕”就是啦,就像那个老着面皮不肯放林道静出走的余永泽一样。不过我必须申明刚才一瞬间我的心理状态,我只是想在酒后双方都放松婚姻意识的时候,趁机神游一番婚前的美景。

这时候从动物园方向又走来一男一女,按照我历来的喜好我还是先说说那女的。她瞧上去还不难看,甚至算得上略有姿色,只是她骨子里那种随时准备和谁吵翻的神经兮兮的劲头让人不舒服。那藕荷色纱裙也嫌长了些,裙裾直抵踝骨。如今这座城市里对自己的身体持这样保留态度的女人已经不多了。再说说那男的,我不知道在日本人眼里他像不像中国人,我只能肯定地说,他在我这个中国人眼里活脱一个日本人的形象。棱角分明的宽边墨镜和镶着一块亮东西的半球形阔檐帽是黑色的,其余就全是白的了,白色圆领半袖背心,白色萝卜裤,白色旅游鞋。还有两件东西也都是白色的:尸体一样背在身后的长袖T恤衫,和窄而长的面孔。这一男一女走到动物园和我们这些户外用餐者之间的马路上

踌躇了一会儿，女人用临时遮住额头的手指了下我们，男人却摇摇头，抬手要拦一辆红色出租车。女人意志坚定地重新指了下我们，拉起男人的胳膊就往一大片餐桌这儿移动。男人回头向出租车司机挥了下手，再转回头时，帽子上那块长方形亮东西便火辣辣地跟日光相撞了。我忙把眼皮合上。

这两个家伙如果看上了这张餐桌，我们就让给他们，回家睡午觉，我说。汪晓燕哼了一声，看也没看我。

那一男一女走近了，在花花绿绿的遮阳伞底下挑来拣去，还真的打量起我们来了，看来他们更注重午餐的软环境。他们开始向我们逼近，我小声对汪晓燕说，有门儿，那男的奔你而来。汪晓燕说，我看是那长裙淑女迷上了你吧。这时候我一下子觉得我真是爱上了我这个老婆，你瞧瞧，她什么时候也学会了“淑女”这个文绉绉的词儿啦！男人走到桌子旁，把一架熏鸡大小的袖珍型摄像机放到桌上，彬彬有礼地问我们，可以么？先生，小姐？我刚要说话，汪晓燕却抢着说可以可以，我们已经吃过了。

说真的此时此刻我有些恼火，我比较敌视彬彬有礼的家伙，如果他碰巧是个男人我的敌意就更加强烈。尤其是有汪晓燕坐在身旁，也跟他一道彬彬有礼，我差一点就要说出脏话来了。这说明我的确爱上了我的老婆。我对那日本风格的男人说，不可以，我们在等另外两个朋友，巧得很，也是一男一女。汪晓燕一把薅起我，陪着笑脸对他说，您别理他，他在重复一个玩笑。我凑近汪晓燕的耳根说，我们要是能玩玩“派对儿”游戏该多好，我有些喜欢上那个长裙淑女啦。汪晓燕愤怒地打了我的手一下。这时那男人忽然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他绕过桌角，直盯着地看着我，大叫一声：彭大力！我大吃一惊，汪晓燕和长裙淑女也大吃一惊，十几张餐桌旁红头涨脸的人们也全都大吃了一惊。

他摘下墨镜说，我是阿钟啊！

接着他又说，你小子！

在这个日本风格的男人的启发式诱导下,我终于知道了他是谁。但当时最令我吃惊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我对自己突如其来的巫师般的预言能力感到了惶惑。刚才我不过是酒后胡言了几句,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为啥会那样说,可是你瞧瞧,另外两个朋友就真的从天而降了,而且真像我曾经预言的那样,阿钟开始死乞白赖地拉着我要喝酒,正儿八经地叫了好多的菜。没怎么的呢,汪晓燕也和阿钟的妻子阿芸称姐道妹,打得一团火热。我和汪晓燕重新举起粉红色塑料杯子,跟另外两只杯子碰来碰去。

阿钟是我许多年前的朋友,大略算一算,相识总有十七八年了。那时候我们在一幢大楼里一道学习群众歌曲的创作手法,拿《战地新歌》当音乐的《圣经》顶礼膜拜。我主攻作词,他主攻作曲,还会拉拉小提琴什么的。说老实话一开始我有点讨厌这个将雪白的衬衫掖到裤子里的业余提琴手,他老是闭着眼睛在走廊尽头拉呀拉的,弄得学习班仅有的两位女士有事没事总要扫他几眼。我们友谊的建立得归功于那一年初秋的地震。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吵嚷声惊醒,穿着短衣短裤从七楼一直跑到一楼。我想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明白为什么睡得好好儿的非要这样干,直到跑到大街上之前许多人都以为这是在搞军事演习。那个年代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对这种将睡眠拦腰斩断的军事游戏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天凌晨我趿拉着一只凉鞋节奏匀称地做下降运动时,阿钟就跑在我的身旁,碰巧他也只穿了一只凉鞋。我们一面下行一面搭话,猜测着这伙群众歌曲学习班的才子佳人到底要去干什么。阿钟说大概是去救火吧,我说还是夜间急行军的面儿大,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啊。跑到大街上时天已蒙蒙亮了,全城的人都不修边幅地在外边晃动,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像是又有什么最新指示即将发布。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刚才睁开眼睛之前,距我们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发生了6.5级的地震。但既然已经震过了(我们连感觉一番都没来得及),那就不妨在高楼大厦之间聊上几句。阿钟告诉